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特刊 (三)

07
法治日报

星期二
2025年6月17日
编辑/台建林
郭晓宇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学军

渑池兵站抗战烽火记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关镇海露大街，一座“目”字形三进院落清幽古朴，门楣上挂着写有“刘少奇故居”五个大字的匾额，旁边灰色砖墙上“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的牌子格外醒目。

“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1963年被确定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由三处组成。一处是兵站站部，一处是刘少奇故居，一处是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旧址，共同组成了兵站建筑群。”讲解员杨宁对《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为了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1985年，八路军渑池兵站纪念馆成立。

“抗战时期，兵站站部和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旧址周围全是土屋，土屋下一排颇具规模的窑洞，险要的地势，使这里成为兵站存放物资、开会和学习的最佳场所。”杨宁说。

在杨宁的讲解中，记者仿佛置身于当年的烽火岁月。

检察建议助兵站旧址修缮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在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看到前来寻找红色记忆的人络绎不绝，“80后”的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琼对《法治日报》记者感慨道：“留住历史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兵站旧址存在与民居混杂的问题，旧址外墙周围私拉乱设民用电线问题也比较突出，存在安全隐患。”2021年3月，渑池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了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存在的问题，影响了社会公众学习观瞻和受教育的效果。

在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下，2021年4月27日，渑池县检察院在与相关行政机关充分磋商，就修缮方案、资金来源及解决周边安全隐患等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向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及时委托有资质单位对渑池兵站进行修缮，对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加强管控。

相关行政机关高度重视，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方案迅速开展修复工作，2021年5月启动渑池兵站旧址维修工程招标，并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150万元。

“2021年8月初，经检察机关实地复查，渑池兵站旧址维修工程全部完工。”杨琼说。

在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下，相关行政机关对旧址建设控制区内违法建设进行排查，协调对未经批准架设的民用电线进行迁移整改，拆除周边违法建筑30余平方米，并对进出口道路进行拓宽，较好维护了文物历史风貌。不仅统筹解决了文物本体修复及周边建设控制地带安全隐患问题，提升了红色资源保护水平，还扩大了红色文物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

如今，八路军渑池兵站纪念馆围绕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理论”诞生地这一主题，深挖红色文化内涵，扎实做好红色宣传，不断厚植红色文化沃土。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已经成为豫西地区乃至全省全国研学游、机关团体、厂矿企业进行党性修养教育、社会哲学科学教育的红色文化圣地。

作为土生土长的渑池人，年轻的渑池县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邵俊娜是听着八路军渑池兵站的故事成长的。

“遇到思想上的困惑，我常常来这里寻找答案。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特别是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研读让人体会更深。”邵俊娜若有所思地说。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们检察干警起到了极大的教育和激励作用。如今，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让党建红色文化成为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已成为全院干警的自觉行动。”邵俊娜说，结合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学习，渑池县检察院定期组织党员干警到八路军渑池兵站参观学习，谈体会、找目标，强化党员身份意识和初心使命。

像邵俊娜和她的同事一样，如今每年到八路军渑池兵站接受红色教育的人达数十万。

本版照片均由王爱霞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初，华北沦陷，日寇在河北、山西等地烧杀抢掠。八路军东渡黄河和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以中条山为屏障与日军激战。由于当时大兵压境的紧张局势和受国贫民穷财力困乏的经济条件所限，抗日前线物资严重短缺。

1938年5月，豫东大片土地相继沦陷，河南形势严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迁至洛阳。中共中央考虑到豫西一旦沦陷，就要组织力量在伏牛、桐柏山区展开游击战争，于是决定在洛阳设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0月，中央军委统战部负责人刘向三奉命带领一批干部和警卫人员从延安经西安办事处到达洛阳，建立“八路军驻洛通讯处”（1940年改为办事处，简称“洛八办”）。通讯处建立后，只留下十几名人员开展工作，其余的到渑池待命。考虑到渑池的战略位置，刘向三建议在此建立兵站。1938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渑池兵站在渑池东

关小寨村建立。这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设在豫西的一个公开机构。

当时，八路军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辖26个县，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战场之一。八路军作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大都由西安、洛阳用火车经陇海线运到渑池车站，再由兵站安排的民夫、车辆、牲口等运力运往南村渡口，继而运往前线。

“八路军群众基础好，纪律严明，是实实在在抗日救国的军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认可。所以，当地群众都是自发运送军用物资。”杨宁说。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渑池兵站到黄河边的南村渡口一段，成为八路军太行总部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既为抗日前线运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又输送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华北、华东、苏北等地的大批干部和进步学生，是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之一。

1938年11月下旬，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从延安到渑池兵站，并由此北渡黄河，奔赴太行前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同志（当时化名

胡服）由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渑池，在渑池兵站停留近两个月。1938年12月20日，他在兵站召开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又称渑池会议），会议历时7天，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将豫西特委改为豫西省委，将下属的五个中心县委改为五个地委。渑池会议在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杨宁介绍说，抗战初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新党员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各不相同，而且是带着各种不同目的和动机来的，导致党内存在着诸多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对于他们的教育，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在渑池停留56天，刘少奇起草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并利用电台指导中原局的抗战工作，还主动接触一些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做党的统战工作。渑池会议之后，他还指导豫西省委在渑池举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并讲授了中共党史。在第一期训练班上，他首次宣讲了《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撰写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随后被修

订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渑池会议和随后的两期党员训练班，为豫西各级党组织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力量，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11月21日，国际著名医生巴苏·柯棣华率印度援华医疗队在渑池兵站停留两天，由兵站派人护送奔赴太行前线。

“朱德、彭德怀同志曾亲自到兵站指导工作。渑池兵站的建立对于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豫西革命根据地等都起了重要作用，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杨宁介绍说。

“八路军渑池兵站初建时，主要任务是训练干部士兵，一旦豫西沦陷，即为武装斗争做准备。由于抗战形势变化，日寇一时难以西犯，兵站的工作重点也有所改变，主要是中转作战物资，接送保护过往干部，掩护地方党组织召开会议等。”杨宁介绍说。

1940年5月，八路军渑池兵站奉命撤离，站长李鹏带领部分战士首先返回延安。1940年7月，剩余人员全部撤回八路军总部。



渑池兵站旧址。



位于渑池兵站旧址的刘少奇故居。



河南省渑池县检察院干警重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法治探索

□ 黄兰松 黄安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作为抗日敌后战场的坚实依托，不仅承担了军事斗争和政治动员的重任，还开展了诸多治理实践。

1938年1月10日，在河北阜平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完成了民主政权建设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各根据地政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结合本地农村社会实际情况进行的一系列法治实践，不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法治基石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正式提出并推行“三三制”，规定抗日根据地政权由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将“三三制”制度化，明确规定参议会应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

按照这一原则，各根据地出台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豫鄂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等指导文件，建立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层政权体系。同时，《陕甘宁边区选举条

例》等文件规定的选举规则保障了政权机关的群众性和合法性，米脂县参议会甚至出现共产党员主动辞去超额席位，确保中间派占比达标的情况。

这一政治制度的落实不仅确保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领导权力的合法性，也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提供了制度支撑。在此原则下形成的多阶级联合执政的法治模式，成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法治实践的基石。

刑事司法工作的建设

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抗战大局，各抗日根据地积极推动刑事司法工作，在惩治犯罪和维护根据地秩序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取得了显著效果。

各根据地先后颁布了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惩治盗毁空室清野财物办法、危害军队及妨害军事工作治罪暂行条例等文件，以严厉打击破坏抗战秩序的敌对行为，有力保障了军队利益和战时物资安全。

此外，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公务违法法令治罪暂行条例、毒品治罪暂行条例、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文件在遏制职务犯罪和规范行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司法制度建设上，为了防止审判权分散并提高司法效率，各边区普遍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审判权，同时，边区司法工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积极探索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的审判模式，形成了

以“巡回审理”“群众参审”和“调解优先”为主要特点的基层审判机制。

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1942年起，晋察冀边区政府陆续颁布多项政策文件，建立起以三级调解制度为核心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开创了群众矛盾调处的创新模式。

《晋察冀边区行政调解工作条例》规定，对于民事纠纷及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边区政府及司法机关应尽可能化解矛盾纠纷，减少诉讼。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强村调解工作与区调处工作的指示》《关于区公所调处案件的决定》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调解程序。对于群众矛盾纠纷，应坚持村级调解优先，区公所复查并指导，不服者可诉至县。

各根据地的调解工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以客观事实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这一制度设计不仅为战时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范例，其坚持群众参与、预防矛盾激化的理念对当代基层治理仍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法定的制度先河

在各个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中，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频繁的人口迁移和不同政权土地政策的差异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紧张与分配矛盾。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各根据地实施了以“减租减息”为主要特征的土地政策，并在《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等法规中，进一步厘清了土地所有权、土地租佃等问题，并要求对土地进行登记管理。

这一系列探索与实践为国家开创了“土地法定、地权证定”的先河，奠定了新中国土地改革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推行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但封建陋习依然猖獗。为了加快以妇女为主体的大后方的建设，解决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童养媳等问题，建立新民主主义法治化婚姻制度，各根据地结合当地实际状况，研究制定了《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文件。

这些条例普遍规定婚姻自由，结婚与离婚条件与程序、离婚子女的抚养问题等内容，并确立有关婚姻登记制度，着重强调对军人婚姻的法律保护。这些条例不仅充分保障了妇女的权益，还为调解各根据地不断发展变化的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山东大学纪检监察学院）